

违童之愿

冷战时期美国儿童医学实验秘史

[美] 艾伦·M·霍恩布鲁姆、朱迪斯·L·纽曼、
格雷戈里·J·多贝尔 著 / 丁立松 译



Against Their Will

The Secret History of
Medical Experimentation on Children
in Cold War America

51

违童之愿

冷战时期美国儿童医学实验秘史



【美】艾伦·M·霍恩布鲁姆、朱迪斯·L·纽曼、
格雷戈里·J·多贝尔 著 / 丁立松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违童之愿：冷战时期美国儿童医学实验秘史 / (美) 霍恩布鲁姆、
(美) 纽曼、(美) 多贝尔著；丁立松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1

(新知文库)

ISBN 978-7-108-04845-5

I. ①违… II. ①霍… ②纽… ③多… ④丁… III. ①儿童—实验医学—
医学史—美国 IV. ① R-097.12 ② R-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1290 号

责任编辑 刘蓉林

装帧设计 优 昙 张 红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图 字 01-2014-781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9

字 数 224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35.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51

新知
文库

XINZHI

Against Their Will
The Secret History of
Medical Experimentation
on Children
in Cold War America

Against Their Will

Text Copyright © 2013 by Allen M. Hornblum,

Judith Lynn Newman, Gregory J. Dob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 Martin's Press,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新知文库

出版说明

在今天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的出版史上，介绍新知识和新观念的图书曾占有很大比重。熟悉三联的读者也都会记得，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我们曾以“新知文库”的名义，出版过一批译介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图书。今年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 20 周年，我们再次推出“新知文库”，正是为了接续这一传统。

近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知识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涉及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新发现、新探索和新成果层出不穷，并以同样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人类的社会和生活。了解这种知识成果的内容，思考其与我们生活的关系，固然是明了社会变迁趋势的必需，但更为重要的，乃是通过知识演进的背景和过程，领悟和体会隐藏其中的理性精神和科学规律。

“新知文库”拟选编一些介绍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新知识及其如何被发现和传播的图书，陆续出版。希望读者能在愉悦的阅读中获取新知，开阔视野，启迪思维，激发好奇心和想象力。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6 年 3 月

献给 A·伯纳德·阿克曼

他的毕生事业就是伦理与医学的最高典范

致 谢

我们能够在此记述这医学史上的一页，得益于许许多多人的无私帮助。尤其要感谢那些曾是实验对象的人们，以及他们的亲属，当然还有那些不厌其烦地与我们面谈、接受电话采访的医生与医学研究者们，与我们分享他们的回忆，而且有问必答，并允许我们参阅他们的私人笔记、官方文件和照片。

我们要特别感谢曾经作为“国家养的孩子”的查理·戴尔、戈登·沙特克、奥斯汀·拉罗克和约瑟夫·阿尔梅达，回忆了他们在弗纳德学校“科学小组”以及在公立收容机构的种种经历。感谢曾经对马萨诸塞州放射物实验展开调查的特别工作组负责人多伊·韦斯特，为我们提供了她所收集的资料，并把她所了解的弗纳德学校的一切都告诉我们。感谢特德·查巴辛斯基和卡伦·阿尔维斯，愿意与我们会面，并将他们自身或家庭成员的痛苦经历讲给我们。我们也占用了杰西·布莱和帕特·克拉普的大量时间，请她们为我们讲述自己的回忆，构成了这本书的核心内容之一。A·伯纳德·阿克曼、希拉里·科普罗夫斯基、康斯坦丁·马里茨克斯、西里尔·韦克特、切斯特·索瑟姆、阿维·卡根、吉姆·凯彻姆、伊诺克·

卡勒韦等诸位医生也都为我们对冷战时期的医学研究进行深入的了解提供了许多帮助。

在我们搜索文件、论文以及大量医生与医学研究者的私人信件的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许多图书管理员与档案保管者的协助。感谢哈佛医学图书馆、美国哲学协会、纽约大学医学档案馆、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图书馆、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档案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班克罗夫特图书馆、索斯摩大学档案馆、费城医学院、国家档案馆（马里兰大学）、国会图书馆、加利福尼亚大学曼德维尔档案馆（圣地亚哥）、匹兹堡大学档案馆、宾夕法尼亚州立档案馆的支持与帮助。

我们还要感谢帮助我们获得资料并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种种事件与事实的人们，他们是：香农·福克斯、艾伦·米尔斯坦、乔·莱文、珍妮特·阿尔伯特—赫尔曼、埃里克·伯塞斯、杰夫·凯斯、马戈·怀特、保罗·隆巴尔多、薇拉·沙拉夫、弗里德·米西罗、保罗·卢尔茨、杰克·鲍尔、威廉·L·罗森伯格和约瑟夫·K·麦克劳克林。

宾夕法尼亚州 ACURA 研究项目组及其学生沙拉雅·威尔茨、拉达·克根、谢巴赫·法瓦丹和卡里什玛·米诺查，感谢他们在收集相关资料方面给予的支持与协助。并感谢鲁宾基金会和宾州州立大学发展基金会资助的研究资金。

还有一位我们必须感谢的人，就是已故的西德尼·纽曼，他在其漫长的人生之中始终都将有智力障碍的儿童视作最需要关注与关怀的群体。他就是正义的表率。

最后，我们还要感谢我们的经纪人吉尔·马萨尔和 Palgrave 出版社的编辑卢巴·奥斯塔舍夫斯基，是他们注意到了这部作品的重要意义，并使其最终得以出版。

导 言：

“晚上他们就会来把你抓走。”

如果不想等着愈来愈糟的后代犯下罪行，或眼睁睁看着他们因为愚蠢而挨饿的话，就应该淘汰那些显然不适于继续生存下去的人群，这对全世界都是件好事。

——奥利弗·文德尔·霍姆斯

“他们跟我说，我不应该生小孩，也不应该结婚。他们说我存在缺陷，说我有毛病。他们还说：‘你很不稳定，根据你的情况你不能要孩子。’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情况。从没有人跟我说这是怎么回事。我一直以为自己跟别人没什么不同。但我那时还只是个小孩，对结婚这回事也没兴趣，我那时才十四岁啊。说真的，我当时只想离开那里。”回忆起儿时阴冷的马萨诸塞州^①各个收容所辗转度过的糟糕日子，查尔斯·戴尔这样说。1954年，美国正处在冷战最为激烈的时刻。共产主义之火在全世界蔓延。朝鲜战争刚刚结

束，麦卡锡听证会ⁱ 占据了当时政治讨论的焦点。

对小查理而言，这也是他人生中的重要时刻。他刚刚在一家规模宏大、管理森严的州立收容所度过了第一个年头。这里曾经是马萨诸塞州痴呆与低能青年学校，在其成立一个世纪后，成为了高功能残疾儿童收容所，在当时的人们看来，那里就是个塞满了被社会遗弃的人的地方——“低能儿”、“先天愚型”、“怪物”，都是些有缺陷的家伙，更不用说那些“傻子”和“疯子”了。但在今天看来，其中有些人，比如查理，与我们普通人并无差异。

查理 1940 年生于奥本，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南边的一个小城。他母亲是普通的工薪阶层，父亲是个长途卡车司机兼伐木工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加拿大工作。这两个人都是酒鬼，根本不懂得照顾孩子。“我们家有八个孩子，”查理说起他一塌糊涂的少年时代，“五个男孩，三个女孩。父亲对我们还不错，但他很少回家。我们半年能见到他一次就算不错了。我们的母亲是个没救的酒鬼，她对我尤其苛刻，经常挑我的毛病，还总是抽我耳光，有几次都快把我胳膊扯脱臼了。”

查理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很糟糕，他始终连一年级考试都过不去，在他第三次没通过阅读、书写和算术考试之后，加之一些纪律问题，一位社工把当时八岁的他送到了威斯堡的李蒙男校，这里是美国最早的少年感化院，那段经历对这个弱小的金发碧眼的小男孩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你要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他们绝对会狠狠惩罚你，”提起在李蒙工作的那些蛮横的家伙，查理说，“那儿绝不是什么教化儿童的

i 即 1954 年的“陆军—麦卡锡听证会”，美国有线电视网对这一系列听证会进行了现场直播，美国陆军部对麦卡锡在美国各界掀起的反共浪潮与政治迫害以及诸多越权违法行为进行了公开揭露，自此他的权力被大大地削弱了。——译注

地方。你做什么都会遭到惩罚，那里简直叫人喘不过气来。他们对小孩粗暴极了，不仅如此，他们还会把捐来的好东西统统据为己有，衣服、运动器材……什么好拿什么，给我们连个渣都不剩。”

初到这所学校的时候，查理还曾求学心切，对这里充满了期待。“那儿根本不是个上学的地方，”他说，“倒是叫我们干了不少活。我还是个小孩，他们就给我和别的孩子身上套个套儿，让我们拉着裹了毯子的木头板给地板上蜡。我们得来来回回拉上好几个小时，等地板打亮了才能停下来。你要是干得不好或是不听话，他们就会用木板子狠狠揍你的屁股。每块板子上面都有一个小孩的名字，他们想揍你的时候随时就能揍你。”

很多收容学校纷纷效仿这所李蒙学校，马萨诸塞州布鲁克林小流浪者之家就是如此。还有大都会州立医院，窗户上都装了栅栏，给查理这样的孩子们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刚刚十岁出头，小查理被转到沃尔瑟姆的沃特·E·弗纳德州立学校，这所学校历史悠久，是优生学信念的坚定秉持者。由南北战争前的医生与改革家萨缪尔·格里德利·豪创办。他坚信，通过教育授予其正确的技能和恰当的礼仪，有缺陷和残疾的孩子也能够过上相对良好、独立的生活。1848年在南波士顿创立后，这所学校迁到乡间的沃尔瑟姆，这所学校在规模与声誉上都有了巨大的发展。

但是，到了19世纪最后二十年，弗纳德——以及遍布美国各地的大量同类学校——受到了思想变革的巨大冲击。他们不再视自己为残障人的训练者，而是希望通过改革彻底消除残障问题。他们把所有精神与身体上存在障碍的人都妖魔化为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并坚称不应允许这些人繁衍后代。而那些严重弱智和重度残障者就是他们要消除的首要目标，再就是即将退休的、内向的或口吃的

人，甚至连许许多多拥有良好技术和受过教育的非英语国家来的人也包含在内。“所谓智力低下，”这场运动的一位评论家曾如此写道，“纯粹是一种见仁见智的看法，而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时间的观点倾向。”^②如今那些“基因不良”的观点已被隐藏于更加庞大和严格的制度中，绝不会重新回到社会舆论之中。他们会被永久雪藏，有些也许会面临额外的危机。

这项无情而悲观的运动本怀有积极且有建设性的初衷。1880年，查尔斯·达尔文的外甥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创造了“优生学”这个词，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与门德尔关于基因的革命性理论结合在一起。作为点缀，斯宾塞“适者生存”的“自然主义”观点也被掺了进来。结果，一场建立在简单且看似无可争议的科学原理之上的运动诞生了：无论智力、道德还是性格、寿命，所有人性特征通通都取决于一个人的生理构造。一旦这种观念形成，就广为大众接受，几乎无可辩驳。

高尔顿坚信，利用社会所能提供的良好资源有多种方式。这很简单，作为一名社会精英分子——那些兼具英雄品格与出众气质的人——“抚育比一般家庭数量更多的孩子”是他的道德义务。在高尔顿看来，诸如拿破仑、贝多芬、梵·高、路易·巴斯德、俾斯麦这样改变了历史、推动人类进步的人物，就应该多多繁育后代。最优个体才是最适合也最应该多留后代的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文明的进步，促进艺术、科学、文学与政治的发展。

不过，在这场运动中，也有人把关注点更多地放在与优等阶层相对的人群上——这些社会中的贫穷阶层与人类的弃子不仅在拖文明的后腿，更是妨碍这个社会进步的痼疾。这场运动的狂热推崇者之一——查尔斯·本尼迪克特·达文波特认为，那些在他看来有缺点、深层性格瑕疵和严重生理缺陷的人——他总是把他们说成是

“社会最底层”和“劣质品种”——注定会变成乞丐、疯子、小偷和妓女，注定会对社会造成干扰，最终被丢进国家监狱、救济院和医院里。^③最终，从缅因州到加利福尼亚的城市贫民和失地农民、东欧移民、南部黑人、俄裔犹太人、意大利裔文盲、走投无路的墨西哥裔、妓女、窃贼、酒鬼、精神障碍者，以及所有与北欧原型不匹配的人都成为了优生学法西斯主义的潜在受害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各种医学改造计划的关注点都在“退化”以及人类样本持续减少上面，消极优生学——后来正如其名称所证实的——意图减少“劣等样本的繁殖”。^④

对于生存在社会底层的人，尤其是被禁闭在各种改造学校里面的人来说，这个消息简直是致命一击。他们被看作是基因失败的突出实例，命中注定只能过苟且偷生的日子，从事低贱的工作，依赖于他人——或说越来越依赖于国家——的施舍才能活下去。但用了没多久，这些“弱智”，尤其是那些“低能儿、先天愚型和白痴们”就会被当成社会的负担，甚至社会的威胁，成为社会上乞丐、妓女、小偷、罪犯日益增加的原因。^⑤

当时人们还认为，只要把这些入隔离起来，减少其与各种诱惑发生接触，通过政策法律限制其生育和不正常的反社会的异常人格，就会对社会有益。数千人因此被绝育，或送进了各种收容所，在无尽的空虚或药物麻醉中度过余生。幸运的一部分人在这个反乌托邦环境中学会了一些基本技能，比如缝纫、打扫、园艺，等等。这些收容所——许多是专为孩子设立的——无论是在新泽西州的瓦恩兰、纽约州的莱奇沃思，还是宾夕法尼亚州的潘赫斯特，时刻都在上演着人类最恐怖的一幕，造成了不计其数的心理缺陷与身体残疾。

美国对优生学的狂热在 1920 年代逐渐减弱，在大萧条时期进

一步消散，这一概念却在纳粹德国以恶劣而激进的方式蓬勃兴起。与此同时，孤儿院与残疾人收容机构对其接收的人群所采取的治疗方式仍然受着优生学的影响。尽管已经不再在社会上推行，优生学运动已经呈现出其恶果：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被非人道地对待，被彻底地从社会上剥离了。

有证据显示，到了 1940 年，所谓的治疗法已经发展到了极为可怖的状态，甚至一直延续到战后，并贯穿冷战始终。对男性和女性实施绝育手术的方法得到了推广，全美国有半数的州都采用了绝育疗法，甚至还得到了美国最高法院的支持。休克疗法，包括注射胰岛素、甲醇和电击疗法，都是收容所的主要手段，额叶切除术则被营养学家、精神病学家，甚至因医院和疯人院人满为患而过劳烦躁的医生们当成广泛采用的治疗手段。只要能让收容所里人少一点，这些医生们什么方法都敢尝试。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的科学研究可谓影响重大。那些被家人丢进收容所的弃子们发现，终于有人对他们产生了兴趣。战争使医学研究者们急于发现更多的治疗方法，而经过了几十年不人道优生学宣传的浸淫，这些进取心切的研究者四处搜寻，终于发现了获取研究素材的捷径。他们开辟了一种便捷的模式和社会风气——一项来者不拒的开放政策——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流逝益发为研究领域所接受，并在这里生根发芽。

此时的查理已于 1950 年代初进入了推崇优生原则的弗纳德收容所，优生学也许随着第三帝国的消失而渐渐从记忆中远去，但其残影依旧在这个国家盘旋。^⑥只是很快就被另一种意识形态所取代。这种威胁既不是美国本土诞生，亦非根植于基因深处，而是来自外界，更要命的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出现正是要“埋葬”美国资本主义。^⑦共产主义在 20 世纪初的前半段一直被怀疑和警戒，在冷

战时期却成为了“世界稳定最大的威胁”。斯大林和他的苏联军队英勇抗击了纳粹的侵略，出人意料地早早研发出了原子弹，还准备秘密发射当时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苏联对其意识形态和领土上的扩张也丝毫不加掩饰。东欧事件和中国的状况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民族独立的中国，也在苏联发射了原子弹的同时，站到了其马克思主义伙伴一边，为共产主义的未来不遗余力。

一位细心的研究者在写到这个时代时曾说，两个共产主义巨人在此时联手了。苏联对西方世界来说已经是巨大的威胁，而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度与他并肩伫立在了一起。“共产主义与自由世界之间的较量，微妙地倾向了前者那一边。”^⑧

当时的美国从政府到文化、科研各个方面都对这股巨大的威胁迅速做出了五花八门的反应。查理和跟他一样的孩子们发现自己被医学和科研者们盯着，仿佛通过他们就能找到战胜马克思列宁主义竞争者的方法，就像公共卫生机构一直都在说他们能够攻克脊髓灰质炎、肺结核跟癌症一样。

对成千上万这些收容所里的孩子们来说，严峻的经济形势、刻薄的冷战言辞、制药业的扩张与他们半点关系都没有。他们还有更紧迫的状况摆在眼前：严苛的生存环境、严厉的管理者、随时随地的性和暴力的威胁……

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收容所之后，查理曾有那么一瞬间觉得弗纳德还不错。他说：“刚被带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可能这儿会比以前好一点。窗户上没有栅栏，我想他们会让我们在外面待一会儿。说不定这儿是所正经学校，我总算有机会读书了，能学点什么以后好找个工作。”不幸的是，查理的梦很快就破灭了。

“他们什么都不教，”查理说，“我们很想学点东西，但老师们无

动于衷。他们倒是给了些图画书，但从来不教我们。他们还给我们留作业，但不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他们总是说：‘自己看着办吧。’他们什么都不干，只给我们吃药，吃完我们都昏昏欲睡，什么也学不到。我很生气，我跟他们说：‘滚蛋吧，老子自己学。’”^⑨事实上，没有哪个孩子学会了读书。

这些孩子们倒是学会了填装床垫、缝毯子、扎扫把。一到夏天，他们就要步行到附近的田野里去，跟为生计奔忙的佃农一样从早到晚采摘果蔬。但他们并不是佃农，他们还是孩子，背负着沉重的过去，也看不到未来。他们的生活环境已经如此残酷，却还要时不时遭到更多的侵害——机构里大一点的男生甚至会对年纪小的男孩们施以性骚扰。而这一切与弗纳德员工屡屡性侵犯的恐惧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

“等到大家都睡了，他们会在半夜把你抓走，”查理说，“我还很小，别的孩子都比我大。但是他们会抓起一个孩子拖下床，把他带到别的房间对他做那种事。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些机构的人干的就是这种事。”

但是有一天，查理和其他几个男孩被叫去见一个看起来衣着体面的专业人士。这个人允诺带他们去芬威球场，说不定还能去海边，还可以去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参观。“他们说要是我们愿意加入科学小组，就给我们一个米老鼠手表，还带我们去看橄榄球赛。我们都高兴地加入了。只要能离开弗纳德一天，我们什么都愿意。”对于一个一生都被人叫做“弱智”的孩子来说，这个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每个男孩都很开心。

自愿参加了这个小组的孩子们立刻被隔离在一个单独的病房里，每天都被严格监控，强制定期抽血，大小便都必须排泄在指定的玻璃容器里，接受花样繁多的代谢实验和体格检查。即使是原本